

居國南鄉——盤龍城與商代「南土」經營*

陳珈貝**

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的出土，突破過往認為商人勢力僅及於淮河流域之定見。其後隨著考古資料的增加，人們所認知的商代疆域逐步南進西拓，成為跨江南北的廣闊區域。考古資料所反映之商代「南土」文化，雖然稍事補齊文字資料的缺環，但是殷商政權能否統領文化組成紛雜的江漢—洞庭湖區，甚至深入江南，直達傳統文獻中「前交趾」的商土「四至」範圍，則為進一步討論的重點。因此本文於討論中，將殷商政權發展以都邑位置畫分為前、後兩期，考量兩大時段內的「南土」文化變遷，理解「南土」空間範圍的變遷，探討商人南進模式，試圖由此分析商代政權的政治結構。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詳加指正，並提供許多寶貴建議，在此謹致謝意。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本文認為商代前期，殷商政權掌控的「南土」，包括有漢水以東與長江沿岸的零星據點，至於漢水以西與湘西澧水流域則應屬商文化影響區，而非商人所能掌握之地。商代後期，商文化向外發展幅度明顯縮減，不過，黃河與長江流域之間的交流仍持續進行。盤龍城作為商族南土封地核心，其興廢取決於商王政策；而由本土族群所建立的吳城，則是向殷墟進行資源交換的地方政體。本文亦認為殷商政體的權力擴張，並不專以索求資源為導向，「南進掠銅」之說，無法完整解釋商人經營「南土」的原因。

關鍵字：商代、南土、長江中游、盤龍城、吳城文化

一、前言

殷商政權的「南土」，即為商人於政權核心地區以南所轄有的政治疆域。商人自商邑出發南進，沿線興築經營據點，與南方部族建立統屬關係。而「南土」的實際地理範圍，傳世文獻已有敘述，如《淮南子·泰族訓》云：「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漢書·賈捐之傳》則稱：「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¹

《漢書》記載將商土南界定於江淮之間，過往學界也普遍以淮水流域作為商人勢力向南發展的極限，²而《淮南子》認為殷商疆域南達五嶺之說，則少有人採納。直到 1970 年代，由於黃陂盤龍城等商代長江流域遺址陸續出土，考古資料才將殷商「南土」範圍擴展至長江兩岸。其後相關討論多隨大型商代遺址的發現而開展，聚焦於長江中游區域的考古文化面貌。³

¹ [漢]劉安(編)，[漢]高誘(注)，《淮南子》(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93六版二刷，據武進莊氏本校刊)，卷20，〈泰族訓〉，頁13b。[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64下，〈賈捐之傳〉，頁2831。

² 例如陳夢家認為商人南界「約在緯度33°以北淮水流域與淮陽山脈」，島邦男也認為殷室威令所及的範圍南至淮水。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2004重印)，頁311。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弘前：中國學研究會，1958)，頁381。

³ 盤龍城遺跡出土後，李學勤在1976年即以江鴻之名撰文，認為商代南土不僅南達長江，南界更可能超越長江中游。楊權喜則以漢水劃定商文化於湖北勢力範圍。也有研究以香港出土商代玉器、牙璋，論證商王朝與交趾地區已有聯繫。李學勤(江鴻)，〈盤龍城與商代南土〉，《文物》，2(北京，1976.02)，後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

學者重新分析殷商的南方疆域，也多認定商人南進主因，在於王朝對於礦產和海貝等資源的需求。⁴上古時期青銅禮器為家國重器，乃行使權力所憑藉的象徵，因此張光直提出三代都城屢遷，便是要尋找銅錫礦源。在此前提之下，劉莉將商代南土首要城邑盤龍城，視為南方資源北運的樞紐，鄰近據點之設置，也是為了維繫銅原料運輸路線的暢通；而盤龍城的廢棄，代表商都喪失對當地資源的掌控，此番變動可能與吳城文化漸趨興盛有關。⁵

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650-655。楊權喜，〈湖北商文化與商朝南土〉，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奮發荆楚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論文集》(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頁115-121。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漫步》(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頁39。饒宗頤，〈殷代地理疑義舉例——古史地域的一些問題和初步詮釋〉，《九州》，3(北京，2003)，頁53。

⁴ 商人銅、錫原料來源分為南北兩說，不過商人是否開發中原礦區，礦藏含量又能否支應商人所需，仍屬存疑。因此在長江流域發現先秦礦冶遺址後，中原民族「南進掠銅」的說法興盛。石璋如，〈殷代的鑄銅工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6(臺北，1955.06)，頁102。張光直著，張良仁、岳紅彬、丁曉雷譯，《商文明》(瀋陽：遼寧出版社，2002)，頁138-140。「南進掠銅」相關論述參見萬全文，〈商周王朝南進掠銅論〉，《江漢考古》，3(武漢，1992.09)，頁50-57。彭明瀚，〈銅與青銅時代中原王朝的南侵〉，《江漢考古》，3(武漢，1992.09)，頁47-49、46。

殷商時期可能將海貝作為貨幣、裝飾品或賞賜物，而從山東沿海至南海，都可能為商人獲取海貝的地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發現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4)，頁402。近藤喬一，〈商代海貝的研究〉，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頁389-412。

⁵ 張光直，〈關於中國初期「城市」這個概念〉，原載《文物》，2(北京，1978.02)，後收入氏著，《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

近年透過考古點的發掘，已能重啓對商代江漢流域文化的認識。然而對於殷商政權的「南土」，既有研究多限於考察商文化發展幅度，並依此界定商族政治勢力的平面範圍，基本忽略「南土」是殷商民族單方面定義之詞彙，蘊含以商都為核心的政治地理背景。而政治勢力拓殖與文化擴張，更是兩種需要加以區別的現象。

討論商王朝政治勢力的拓殖，是以商人勢力發展進程為研究重心，著重商與地區族群之間的互動聯繫；分析商文化的擴張，則是以包含精神與物質層面的商文化為觀察主體。由於文化傳播可假異族之手，單獨物件即便蘊含商文化特徵，也無法直接引為殷商國土範圍的依據。考量自新石器階段以來，長江流域自身文化的深厚發展，商王朝政治勢力所及之「南土」，絕非均質的平面版圖，而是中原商族逐步南進，掌握眾多點狀區域政治中心，再加以串聯構成的複雜政治疆域。

此外，在「南進掠銅」的論述之下，「南土」被視為礦產資源的供給要地，其地與中央之間連絡管道的暢通與否，影響政權運作甚鉅。「南土」因此受到商人關注，並被定位為中央直轄操控的特區。不過，商人南進歷程與中原青銅工藝的發展，其實並未形成對應關係。當盤龍城廢棄，商人於長江流域勢力明顯衰退，同時期的中原青銅器的生產和技術，卻逐步邁向成熟階段。⁶將殷商王朝視為挾武力掠取資源的政體，已無法充分解釋

公司，1990)，頁9-12。劉莉、陳星燦，〈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二里頭和二里崗時期中心和邊緣地區之間的關係〉，《古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71-134。

⁶ 張昌平，〈夏商時期中原與長江中游地區的文化聯繫〉，頁60。

商人擴張的動機，也未能完整呈現商人經營南土的模式，相關論述實有再行檢討之處。

本文首先依據文獻與卜辭等文字記載，討論殷商政權領域的基本規劃，整理殷商南土方國梗概。其後以考古資料為基礎，分析殷商王朝南向政治勢力版圖，以及文化影響範圍。此部分討論以盤龍城和吳城文化為主軸，探索兩系強勢文化的發展，分析其城邑聚落屬性，據此重新檢視「南進掠銅」論述的基礎，判斷商人是否專門以擷取資源的角度，規劃王朝「南土」疆域？而「南土」歷經從盤龍城到吳城的區域核心變遷，又能否視作礦產資源掌控權改易所造成的結果？希望透過檢視既有論述的合理性，將討論回歸至商人南土經營的根本脈絡，進而對商代「南土」的地域政治結構，形成更深一層的認識。

二、殷商政權國土結構與南土方國

(一) 殷商政權領域的構建

商代於傳世文獻常被描述為一個控有四方、幅員遼闊的政權，《詩經·商頌》便稱商人「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⁷而《尚書·立政》亦言「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⁸徵之以卜辭，商代政權的確有「商」和「四方」的相對並立的空

⁷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毛詩》，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漢魏古注十三經》(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20〈商頌·殷武〉，頁168；卷20〈商頌·玄鳥〉，頁166。

⁸ [清]孫星衍，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

間概念，分別指涉商邑與商邑以外東、西、南、北四個方向的土地。例如，《小屯南地甲骨》1126：

南方？

西方？

北方？

東方？

商？

王弼米？⁹

而「四方」又與「四土」相通，商王即間雜使用「四方」和「四土」卜問各地受年（收成）。¹⁰在「四土」所涵括的空間之內，方國林立，商王更將之視作施政重心。例如卜辭可見到商王對南土局勢的關注，曾數次卜問：

己未卜貞，多𠄎亡禍在南土？

己[未]卜貞，雀亡禍，𠄎（果）告事？

庚申卜貞，雀亡禍南土，𠄎（果）告事？¹¹

2004二版），卷24〈周書·立政〉，頁471。

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上海：中華書局，1983），頁930。

¹⁰ 例見《小屯南地甲骨》2377與《殷契粹編》90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頁930。郭沫若，《殷契粹編》，收入郭沫若著作編輯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三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第907片，頁84、119。為避免混淆，本文以下言及「四方」或「四土」之處，將只使用四土一詞。

¹¹ 《殷墟文字甲編》，2902。釋文轉引自李學勤，〈盤龍城與商朝南土〉，

歷來研究認為「四土」即傳世文獻所述之「外服」，而卜辭屢見人、地同名的現象，更是方國首領受商王分封例證。諸方身為商王外臣，有納賦從征的責任。¹²方國經商王冊封，其領域便納入商代政權行政區劃。因此所謂「四土」觀念，代表了在政權王畿之外，商人所統轄的政治疆域。

若以商文化散播幅度加以區分，則四土又代表了商文化核心區以外的商文化亞區與商文化影響區。商文化亞區意指分布於商文化中心周邊，與商文化同源，爾後又漸行異化的環形文化帶，並成為傳播商文化的中間環節。¹³商文化影響區則是以同商文化並行發展的地區性青銅文化為主體，該地既明顯與商文化有別，又與商文化交流往來。由於商人政治勢力所及，也涵蓋有臣服於商室的異族方國，故有學者再將這批方國囊括的範圍，再行劃出商文化附庸區。¹⁴

頁653-654。

¹² 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收入氏著，《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第一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0），頁1-40。楊升南，〈卜辭中所見諸侯對商王室的臣屬關係〉，收入胡厚宣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128-172。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99-112。

¹³ 詳見宋新潮，《殷商區域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200。盧連成，〈商代社會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構與周邊地區青銅文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4（西安，1994.12），頁58。

¹⁴ 詳見盧連成，〈商代社會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構與周邊地區青銅文化〉，頁60。此外，商文化影響區又與卜辭或文獻記載之「多方」或「四至」區域相符，不過由於該區已超越商代政權國土政治結構，應屬商人所認知的天下格局，故本文並不進行討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方國與商室關係和、戰不定，某些獨立異族方國範圍也可能橫跨兩區，因此「多方」或「四至」與四土之間的界線不但未能固定也相當模糊。參見宋鎮豪，〈商代的

在四土範圍內，分布有商人直接入駐的據點，以及被稱為「某」或「某方」的方國部族。方國服從商王號令，領導者受賜封爵或入朝任職，並向商人繳納農穫與其他資源，也於戰爭時供商王差遣。而無論是商族經營據點或是異族方國，通常亦是商文化傳播的地方性中心。不過，縱使商人處於權力結構中的相對優勢地位，異族方國仍為具有獨立性之政治實體，也擁有自身的文化傳統，因此商族與四土諸族之間，政治與文化影響力消長並陳，兩者從屬關係時有變動並不穩固。

(二) 卜辭所見南土方國

卜辭中目前可查考之南土方國計有虎方、盧方、林方、危方、興方、風方、中方、雩方、息方九個方國，茲分述如下。

1. 虎方

虎方相關卜辭僅一條：

□□〔卜〕，□，〔貞令望眾〕其^𠄎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卜〕，□，貞令望乘眾^𠄎其^𠄎虎方，告于丁。十一月。¹⁵

上文「^𠄎」字釋為途，可知商人將至虎方。由於殷師經略四方，均會

王畿、四土與四至》，《南方文物》，1(南昌，1994.03)，頁55-59、48。

¹⁵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三冊(上海：中華書局，1978)，6667，頁1023。釋文據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卷三(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頁831。《甲骨文校釋總集》將本條卜辭「^𠄎」方釋為「象」方，但據其字形應釋為「虎」(虎、𠄎)。

號召當地封國部族從征，而同赴虎方的望、舉兩師俱為南方部族，故可推論虎方為南土諸方之一。又依周初《中方鼎》銘文載「惟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可知虎方地處商周南境。¹⁶而該條卜辭為商王經略南方之前，告祭先祖的唯一紀錄，虎方似為商人所重之方國。¹⁷然而虎方地望與文化屬性仍無法判明，卜辭所言僅是商王對南土方國用兵之實證。

2. 盧方

依據卜辭載「盧方白灋……王永。大吉」，可知盧方為商之方國。¹⁸又根據西周史密簋銘文所示，盧方與虎方俱屬「南夷」，故學者多以此將盧方視為商代南土方國之一。¹⁹

3. 林方

林方方國之名出現於商末：

¹⁶ 見李學勤，〈盤龍城與商朝南土〉，頁115-116。

¹⁷ 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國史研究》，3(北京，1995.03)，頁101。

¹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T00667，頁888。釋文據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卷十八，667，頁6080。

¹⁹ 史密簋銘文為「惟十又一月，王命師俗，史密日東征，會南夷。盧、虎會杞夷、舟夷灌不墮……。」詳見張懋鎔、趙榮、鄒東濤，〈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義〉，原載《文物》，7(北京，1989.07)；後收入氏著，《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24-33。

丙戌〔卜〕，〔才〕淮，〔貞王〕□于□，〔亡災〕。

庚寅卜，才漚既，貞王番林方，亡災。²⁰

林方於商王帝辛征人方途中為王師所攻取，其地依卜辭紀錄距漚地為一日路程，可知林方位於淮水流域，或有考證其族屬淮夷。²¹林方之後與商亦有通婚及參與征人方的卜辭紀錄。²²

4. 危方（下危）

危方與商人間衝突不斷，下引兩條卜辭相關記載。其一：

乙卯卜，般，貞王勿比望乘伐下危，弗其受出又。²³

其二：

丙戌卜，爭，貞今者王比望乘伐下危，我受出〔又〕。²⁴

危方地望學界多從陳夢家考訂，以其地處今河南、安徽兩省之間。²⁵

²⁰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十二冊(上海：中華書局，1983)，36968，頁4598。釋文據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卷十二，頁4114。

²¹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307。

²² 卜辭有「呼取女子于林」、「甲寅……，林次……商公宮」等記載顯示林方與商室通婚，並且隨商王征人方，其地為當時商軍駐札之處。詳見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四冊(上海：中華書局，1979)，9741正，頁1417。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十二冊，36547，頁4551。釋文據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頁196。

²³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一冊(上海：中華書局，1982)，32正，頁7。釋文據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卷一，頁7。

²⁴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三冊，6496，頁978。釋文據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卷三，頁808。

²⁵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頁300-301。

而商人攻打危方更有俘獲危人與車、盾兵器等戰利品的紀錄：

小臣𠄎比伐，𠄎危美…人二十人四，而千五百七十，𠄎百…丙，
車二丙，𠄎百八十三，𠄎五十，矢……。²⁶

5. 興方

興方與商人關係較為穩定，曾參與商王祭祀，卜辭載「壬寅卜，𠄎，貞興方以羌，用自上甲至下乙」。²⁷由於興方曾從王師征危方，可暫行推測其地鄰近危方，亦即豫皖兩省間。

6. 風方

卜辭稱風方者僅一條：

□□卜，其𠄎風方，𠄎……大吉。²⁸

關於風地者則另有記載，諸如：

□亥王卜，才風，貞步于危，亡災。²⁹

風地依據卜辭近於危方，故知其地位於南土地區。³⁰

²⁶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十二冊，36481正，頁4541。釋文據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卷十二，頁4059。

²⁷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一冊，270正，頁66。釋文據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卷一，頁43。

²⁸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十冊(上海：中華書局，1981)，30258，頁3696。釋文據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卷十，頁3371。

²⁹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十二冊，36961，頁4597。釋文據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卷十二，頁4114。

7. 卣方

卣方為商王屢次征伐之國，諸如：

壬寅卜，貞今者王伐卣方，受出又，十三月。³¹

貞王伐卣方，受出又。³²

商王於曾地時，曾號令擒卣。故卣方之地應近於曾，位處南土。³³

□□卜，殷，貞王貞于白，迺乎覈卣〔方〕。³⁴

8. 雩方、雀

雩方為商王征討對象，兩則主要卜辭記載如下。其一：

□□卜，弜、雀噩在南土，𠄎（果）告事？

戊午卜，弜克貝（敗）隳南邦方？

己未卜，惟雩方其克貝（敗）弜在南？

己未卜貞，多𠄎亡禍在南土？

³⁰ 丁山認為卜辭之風方即為風夷，其故地為漢代六安國之安風縣，當今安徽霍邱之南。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148-149。

³¹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三冊，6543，頁991。釋文據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卷三，頁814。

³²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三冊，6541，頁990。釋文據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卷三，頁813。

³³ 曾地經丁山考證位於今河南新鄭與密縣之間，為商代以及周初經營南土必經之路。詳見丁山，《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頁106-107。

³⁴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三冊，6536，頁989。釋文據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卷三，頁813。

己[未]卜貞，雀亡禍，^囧（果）告事？

庚申卜貞，雀亡禍南土，^囧（果）告事？

辛酉卜貞，雀亡禍南土，^囧（果）告事？

壬戌卜貞，多^雷亡禍[在]南土，^囧（果）告[事]？³⁵

其二：

癸亥卜，王曰：余自征？不征？

子卜，千授王祐？

乙丑卜，示授王祐？

……千其棄^雩方？

庚午卜貞，土^雷亡禍在南土？

甲戌卜^玦，于來丁酉父乙^頤？³⁶

由第一則卜辭可知商王連日進行占卜，確認雀與多^雷在南土是否安全無禍。第二則卜辭則提及商王正在考慮是否親征^雩方。³⁷而奉命征伐^雩方之「雀」，由於商王常自戰場鄰近方國發兵，也被相關研究視為南土方國，是一支與殷商政權關係密切的盟邦。³⁸

³⁵ 《殷墟文字甲編》，2902。釋文轉引自李學勤，〈盤龍城與商朝南土〉，頁653-654。

³⁶ 《殷墟文字甲編》，2907。釋文轉引自李學勤，〈盤龍城與商朝南土〉，頁654。

³⁷ 李學勤，〈盤龍城與商朝南土〉，頁654。

³⁸ 詳見鄭杰祥，《商代地理概論》（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頁221-223。

9. 息方

息方少見於卜辭，僅知有「婦息」一詞，顯示息與商王可能曾有締結婚姻關係。³⁹河南羅山蟒張商代墓葬出土的「息」字之銘銅器，則顯示息方似乎即據守於今河南省南部，為一緊鄰商都核心區域之南的方國。⁴⁰

上述多為戰爭紀錄的卜辭，顯示南土方國似乎難有長期穩定之局，商王也不斷採取軍事途徑，試圖穩固於南土之勢力，此現象呼應了《詩經》稱武丁南征「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之景。⁴¹目前可考方國多半位處淮河流域地帶，可能為殷商政權定都殷墟時期(武丁至帝辛時期)南土的主要範圍。

三、盤龍城與商代前期「南土」

殷商時期的江南地域，礙於考古資料較缺乏劃期依據，常無法與中原商文化分期作出精確對應。因此本文著眼於殷商政權地點的移轉，將相關討論區分為殷都北遷之前的商代前期(二里崗期)，以及遷都後的商代後期(殷墟四期文化)兩階段。

商代前期是上古中原文化南進的重要階段。自新石器時代末期以來，江漢流域逐步接收北方鄭洛文化因素。二里頭文化時期，當地一些聚落的

³⁹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一冊，2354白，頁468。

⁴⁰ 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羅山縣蟒張後李商周墓地第二次發掘簡報〉，《中原文物》，4(鄭州，1981.08)，頁4-13。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管會，〈羅山蟒張後李商周墓地第三次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鄭州，1988.02)，頁14-20。

⁴¹ 毛亨(傳)、鄭玄(箋)，《詩經》，卷20〈殷武〉，頁2308。

文化面貌已具有中原文化特色，其後長江邊岸出現由商族直接經營的城邑，長江中游乃至湘贛流域的政治地理結構相應出現變動。本部分將略述中原文化南進的歷程，並以盤龍城商城為中心，探討長江中游區域在商代前期物質文化面貌，以及各類文化群體勢力的消長。⁴²

(一) 中原文化勢力南下

新石器時代末期，北方龍山文化強勢向南方發展，取代或整合了長江中游文化既有的文化面貌，以石家河文化為主體的區域結構日益鬆動。石家河文化勢力範圍日趨縮減，明示了龍山文化的強勢經濟地位，之後二里頭文化的發展更趨深入。

過去根據考古資料，普遍認為中原二里頭文化進入江漢地區的路線可分為兩條，一是沿豫省東南經大悟、孝感一帶抵達盤龍城，並逆江而上至荊南寺遺址；一是經南陽盆地南下，沿漢水向南發展。⁴³然而長江中游地區二里頭時期的考古資料至今仍然相當稀少，除卻盤龍城、荊南寺與下王崗等主要遺跡之外，多為器物零碎的灰坑，並未發現墓葬，僅能推測遺址的相對年代。

二里頭文化時期的遺址泰半發現於長江以北，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與

⁴² 商文化向東南區域的傳播，大抵以安徽銅陵為限，故商人「南土」範圍未達長江下游。李朝遠，〈吳地青銅器未受商文化影響論〉，《上海博物館集刊》，8(上海，2000)，頁79-97。

⁴³ 拓古，〈二里頭文化時期的江漢地區〉，《江漢考古》，1(武漢，2002.03)，頁86-87。徐燕，〈豫西地區夏文化的南傳路線初探〉，《江漢考古》，3(武漢，2005.09)，頁54-62。

江陵荆南寺遺址爲此區域主要的二里頭時期遺跡。地處漢水下游的盤龍城遺跡在建城前的二里頭時期(亦即盤龍城一至三期)，便散布著李家灣、楊家灣和楊家嘴等三處規模不大的聚落，王家嘴則爲製陶作坊。⁴⁴而在盤龍城周邊地區，還發現有大悟土城與墩子畷等同期遺存。⁴⁵就整體文化面貌而言，盤龍城早期文化因素與河南偃師、鄭州等地的二里頭文化面貌接近，⁴⁶顯示中原二里頭文化南下，取代當地原有文化的主導地位。

至於位於江陵(今荊州)的荆南寺遺址，文化內涵則十分複雜，在當地土著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之外，尚受到峽江與湘贛地區文化影響。中原二里頭文化於該地僅佔次要地位，除了鬲、大口尊與深腹罐之外，缺乏二里頭類型器物，荆南寺遺址早期階段所代表的文化，應是一支與各地區俱有聯繫的江漢土著文化。⁴⁷漢水中下游是中原文化向南發展的另一通道，目前已發掘有淅川下王崗、襄陽法龍王樹崗、鐘祥亂葬崗以及棗陽墓子崗等

⁴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頁498-499。武漢市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陂縣文物管理所，〈1997-1998年盤龍城發掘簡報〉，《江漢考古》，3（武漢，1998.09），頁34-37。

⁴⁵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悟縣城關鎮雙河村李家灣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3（武漢，2000.09），頁16-22。熊卜發，〈淺談鄂東北地區古代文化〉，收入熊卜發編，《鄂東北地區文物考古》（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頁3。

⁴⁶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頁441。

⁴⁷ 何驚，〈荆南寺遺址夏商時期遺存分析〉，收入北京大學考古系編，《考古學研究(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86-89。荊州地區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系，〈湖北江陵荆南寺遺址第一、二次發掘簡報〉，《考古》，8（北京，1989.08），頁679-698。

二里頭文化時期遺址。⁴⁸浙川下王崗遺址的二里頭文化層，出土石器和陶器均與偃師二里頭文化相近。⁴⁹而襄陽、棗陽與鐘祥等地所發現的同類型遺跡，則顯示中原地區文化經南陽盆地南下，沿漢水向南推進的趨勢。

(二) 作為商人城邑的盤龍城

武漢黃陂盤龍城遺址於二里頭文化時期便已形成聚落，二里崗時期（盤龍城三至七期）商文化於此漸有發展，其後商人更築起外環壕溝的盤龍城（二里崗上層一期偏晚；盤龍城四期偏晚）。⁵⁰商代盤龍城城址坐落於整體遺址區的東南崗地，城址東半部濱湖。南段城壕並架有木構設施，推斷當時城壕可能外接有運輸水道。⁵¹在城址內部的東北區域，迄今發掘有兩座位於南北中軸線上的宮殿遺址，以及宮殿北側的廊廡，並有可能為宗廟的夯

⁴⁸ 荊州市博物館、鐘祥市博物館，〈鐘祥亂葬崗夏文化遺存清理簡報〉，《江漢考古》，3(武漢，2001.09)，頁38-43。襄石復線襄樊考古隊，〈湖北襄陽法龍王樹崗遺址二里頭文化灰坑清理簡報〉，《江漢考古》，4(武漢，2002.12)，頁44-50。魯西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123-124。

⁴⁹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編，《浙川下王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頁337。

⁵⁰ 近年研究指出盤龍城外緣可能還建有一層夯土城垣，為受兩重城垣保護的地方城邑。劉森森，〈盤龍城外緣帶狀夯土遺跡的初步認識〉，收入武漢市委宣傳部、武漢市歷史文化名城委員會主編，《武漢城市之根·商代盤龍城與武漢城市發展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頁190-197。

⁵¹ 發掘報告推斷此設計與城址南面的府河有關。此外，盤龍湖也可能與長湖、張斗湖等湖群串接，再透過府河通聯長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頁42。

土遺跡。城址規模不大，宮殿採前朝後寢格局，形制類同鄭州商城。⁵²

盤龍城的興築，連帶促成當地聚落發展，而周邊區域為配合新城的需求，性質功能均有所轉變：城址南端王家嘴，早期住民所建立陶窯已不復見，轉型為一居住聚落；城址東面的李家嘴區，則由居址轉變為貴族墓地。城址北部楊家灣為與盤龍城同步發展的聚落，並發現疑為用於鑄煉的坑溝與陶缸，在其外環還有等級不一的墓葬散落分布。楊家灣以東為楊家嘴遺址，目前發掘有平民墓葬以及與銅器鑄煉相關的灰溝，而位居楊家灣西南處的樓子灣，也同樣發現了墓葬與冶煉遺跡。基本而言，盤龍城遺址隨著居民增多，城外居址與墓地均不斷擴大，形成以盤龍城為中心的聚落群。⁵³

目前對於盤龍城遺址的發掘，尚未發現銅器與陶器、漆器等用器作坊遺址，⁵⁴僅楊家灣與樓子灣出土銅渣，並有充作坩鍋的大口缸，但卻未能

⁵² 盤龍城城址性質目前有宮城與郭城兩說，礙於遺址發掘有限，故未能確知其性質。詳見楊鴻勳，〈盤龍城商方國宮殿建築復原研究〉，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頁629-649。杜金鵬，〈盤龍城商代宮殿基址討論〉，《考古學報》，2(北京，2005.04)，頁178。

⁵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頁498-499。

⁵⁴ 漆器殘跡散見於盤龍城遺址各墓葬，楊家嘴水井遺址(J1)發現一件漆觚，黃州的商代墓葬亦曾出土疑似漆器的殘塊。武漢市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陂縣文物管理所，〈1997-1998年盤龍城發掘簡報〉，頁43。黃岡地區博物館、黃州市博物館，〈湖北黃州下窯嘴商墓發掘簡報〉，收入吳曉松主編，《鄂東考古發現與研究》(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頁164。

發現鑄範，最多只能證明該地曾有冶煉之舉，而使盤龍城青銅器出現自製，抑或由都城鄭州輸入的疑義。不過盤龍城青銅器在部分外形紋飾，以及技術細節層面，與鄭州商城同類器已略顯差異，鑄器使用的蕊撐質材也源自本地。⁵⁵盤龍城經營者理應能自行鑄造青銅器，用於吉凶禮事所需，毋須全數仰賴北方都城供給。陶器、漆器工坊則可能位於城郭內，或是遷至聚落周邊。

在盤龍城城區之外，還存在著許多小型聚落或墓葬。黃陂地區於魯臺山、鍾分衛灣、枞桐鄉紅進村、郭元嘴等地，都曾出土商代墓葬或散件青銅器。⁵⁶位在盤龍城之南的武漢新洲香爐山遺址，是由新石器時代延續至商代，遺存較具規模的遺址，文化面貌與中原殷商文化相近。⁵⁷長江岸邊，武漢以東的黃州區，亦曾出土商文化遺存。⁵⁸盤龍城以西，孝感地區的潁水與滙水中下游處，目前發現有聶家寨、漲水廟與城隍墩等商代前期遺

⁵⁵ 張昌平，〈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江漢考古》，1（武漢，2003.03），頁45-51。南普恒、秦穎、李桃元、董亞巍，〈湖北盤龍城出土部分商代青銅器鑄造地的分析〉，《文物》，8（北京，2008.08），頁77-82。

⁵⁶ 黃鋁、況紅梅，〈近年黃陂出土的幾件商周青銅器〉，《江漢考古》，4（武漢，1998.12），頁24。熊卜發，〈湖北孝感地區商周古文化調查〉，《考古》，4（北京，1988.04），頁301。熊卜發、鮑方鐸，〈黃陂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江漢考古》，4（武漢，1986.12），頁27。孝感地區博物館，〈孝感、黃陂兩縣部份遺址複查簡報〉，《江漢考古》，4（武漢，1983.12），頁1-13。

⁵⁷ 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湖北新洲香爐山遺址(南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武漢，1993.03），頁14-19、87。

⁵⁸ 黃岡地區博物館、黃州市博物館，〈湖北黃州下窯嘴商墓發掘簡報〉，收入吳曉松主編，《鄂東考古發現與研究》，頁164-169。

址。⁵⁹若續往西北，隨州廟臺子挖掘有商代前期的房基、灰坑與墓葬遺址。⁶⁰而在同地淅河鎮境內，也曾於掘獲十多件商代青銅器。⁶¹

盤龍城的領導階層不僅鑄造青銅器，也出現了二里崗期商文化少見的高級別墓葬。當地文化發展是否具備獨立程度，從而塑造地域特質，頗引人關注。從墓葬資料所透露的禮俗來看，隨葬器物組合與中原並無明顯差異，而當地墓葬慣以底部設腰坑殉狗，基底或隨葬品塗上朱砂，也是慣見於中原的葬俗。不過對比商代前期各地墓葬，盤龍城採用腰坑和塗朱葬俗的比例甚為突出。⁶²腳坑、頭坑的出現，以及樓子灣普遍以硬陶器與坩鍋隨葬，也是深具地方風格的表現。

盤龍城的主要功能性質，計有商王南征據點、徵集資源轉運點，以及作為地域政治中心或方國都城等數種說法。觀察當地自鑄青銅器的發展與使用模式，可知盤龍城經營者並未有在中原政權之外，另創禮制的舉措，

⁵⁹ 孝感地區博物館、孝感市博物館，〈湖北孝感聶家寨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武漢，1994.06)，頁1-13。熊卜發，〈淺談鄂東北地區古代文化〉，頁3。

⁶⁰ 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館、隨州市博物館，《西花園與廟臺子》(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頁148-161。

⁶¹ 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縣發現商代青銅器〉，《文物》，8(北京，1981.08)，頁46。

⁶² 張渭蓮統計盤龍城墓葬設有腰坑者占66.7%，採塗朱葬俗者也高達66.7%，對二里崗期各地商城墓葬的統計均不滿20%。不過此一高比例數據成因，主要是用於統計的墓葬總數過少導致(6座)。本文重新統計盤龍城遺址內現有42座墓葬資料，該地墓葬設有腰坑比例約為26.1%，採塗朱葬俗者約30.9%，仍可見當地對此類葬俗的偏好。張渭蓮，《商文明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頁90、94-95。

但於物質文化範疇內多所改造，對於現行禮俗也有擇選偏好的空間。此現象或許可映襯出商代政權在武力征服以外，經營南方領域的統治模式。衡量商代整體政治制度發展，盤龍城規格為一都城，城邑持有者受用高等級禮制，應是一方國之都。

(三) 盤龍城周鄰的考古發現

商人以盤龍城為中心，聚居於今日武漢、孝感乃至隨州一帶，其勢力向東發展至黃岡黃梅意生寺遺址，但至黃石南部即為削弱，陽新大路鋪遺址便已深受硬紋陶文化影響；⁶³更向西南之咸寧地區，少有商文化遺跡出土。⁶⁴但在長江南岸，鄱陽湖西側的九江至德安一帶，又出現商文化蹤跡。當地以九江龍王嶺遺址發展較早，該遺址是一個以商文化為主體，並受地方性文化影響的聚落，其活動時間早於盤龍城的修壕建城。⁶⁵鄰近長江的九江神墩和瑞昌銅嶺遺址，至遲於商代中期開始發展，應是為配合商人戰略或資源需求而設立的據點。⁶⁶然而往南至德安地區，石灰山遺址則顯

⁶³ 張昌平，〈夏商時期中原與長江中游地區的文化聯繫〉，《華夏考古》，3，（鄭州，2006.09），頁5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陽新縣博物館，〈陽新大路鋪遺址東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3（武漢，1992.09），頁21。

⁶⁴ 咸寧地區目前僅於崇陽白霓新堰汪家嘴出土一件商周銅鼓，且深具地方特色。鄂博、崇文，〈湖北崇陽出土一件銅鼓〉，《文物》，4（北京，1978.04），頁94。

⁶⁵ 江西省九江縣馬回嶺遺址調查隊、九江市文化名勝管理處、九江縣文物管理所，〈九江縣龍王嶺遺址試掘〉，《東南文化》，6（南京，1991），頁174-179。

⁶⁶ 詳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昌博物館，《銅嶺古銅礦遺址的發現與研

示相當地方特性，為與盤龍城平行發展之聚落，可推知商人的政治版圖未能擴及修水。⁶⁷

漢水東岸典型商文化遺址遍布，漢水以西文化則以自身脈絡發展為主軸。⁶⁸相關研究多引漢水為界，將江漢平原商代文化劃分為東、西兩區，⁶⁹並且將湘北鄂西視為鼎釜文化區。⁷⁰荊州地區的荊南寺遺址，遺存雖然出現商文化色彩，但仍以釜、鼎、大口缸和鬻所組成的炊器器群為主，並與周邊遺存有廣泛聯繫。荊南寺遺址地方色彩濃厚，居民使用釜、鼎炊器

究》（南昌：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頁7、11。江西省文物工作隊、九江縣文物管理所，〈九江神墩遺址發掘簡報〉，《江西歷史文物》，2（南昌，1987.12），頁1-19。

⁶⁷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德安縣博物館，〈江西德安石灰山商代遺址發掘簡報〉，《南方文物》，4（南昌，1998.12），頁1-12。

⁶⁸ 漢水以西地區商代前期遺址發掘資料甚少，諸如二里崗時期的江陵張家山遺址，以及由清江打撈出土的枝城市王家渡銅壘。沙市李家臺早期遺存年代亦屬二里崗時期，但文化面貌較為複雜。詳見陳賢一，〈江陵張家山遺址的試掘與探索〉，《江漢考古》，2（武漢，1980.06），頁79-82。黎澤高、趙平，〈枝城市博物館藏青銅器〉，《考古》，9（北京，1989.09），頁775。彭錦華，〈沙市李家臺早期文化遺存淺議〉，收入湖北省考古學會選編，《湖北省考古學會論文選集（三）》（武漢：江漢考古雜誌社，1998），頁61-67。

⁶⁹ 楊權喜便認為商代漢水兩岸的文化面貌差異明顯，漢水以西的商文化遺跡發現零星，僅見二里崗期的商文化，顯示商朝未能完全控制漢西。楊權喜，〈湖北商文化與商朝南土〉，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奮發荊楚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論文集》，頁117-121。

⁷⁰ 鼎和釜為南方地區文化於商代遺存中的代表性炊器，研究者認為鼎釜形制發展具有典型性，應為一支地方性文化的實體，文化延續時間貫穿整個商代。詳見范學斌、張萬高，〈簡論湘北鄂西地區商時期的鼎釜文化〉，收入湖北省考古學會選編，《湖北省考古學會論文選集（三）》（武漢：江漢考古雜誌社，1998），頁39-48。

遠多於盤龍城慣見的鬲、甗，應屬受到商文化影響的地區性文化。⁷¹

長江南岸的澧水流域和沅水中下游，也是受到商文化影響的地區。澧水流域石門皂市商代遺址，以及鄰近的寶塔遺址與桅崗墓葬，大約是早商延續至晚商。⁷²石門皂市所出土遺物，陶器以釜、鼎為主，青銅製品則僅見小型製品。相關遺存除了沿用鄭州二里崗上層器物，也對商式器物進行改造。而寶塔遺址出土器物則可分為兩組，其中代表當地土著文化的釜、鼎器物組合，遠多於以鬲、簋為代表的商文化因素。商代前期階段，澧水流域青銅文化受到商文化影響，地區性因素仍始終佔居主體。⁷³

不過同樣位於湘西的不二門遺址，則是以漁獵經濟為主體的獨立聚落，與峽江、鄂西山區從屬同一文化系統。⁷⁴商代前期，漢水西岸以及澧

⁷¹ 荊州地區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系，〈湖北江陵荊南寺遺址第一、二次發掘簡報〉，頁679-698。何鶯，〈荊南寺遺址夏商時期遺存分析〉，頁78-100。

⁷² 桅崗墓葬曾出土與二里頭二期文化形似之玉璋，顯示澧水流域受到中原文化影響的時間有可能更早。王文健、龍西斌，〈石門縣商時期遺存調查——寶塔遺址與桅崗墓葬〉，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學會，《湖南考古輯刊》，4(長沙，1987.10)，頁15-17。何介鈞，〈湖南省商時期古文化研究〉，收入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省博物館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頁62-63。

⁷³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門皂市商代遺存〉，《考古學報》，2(北京，1992.04)，頁185-219。

⁷⁴ 不二門遺址位於湖南永順縣南的靈溪鎮，為由多個發掘地點組成的遺址群，遺址年代為商周時代。遺址文化性質單純，說明當地是一個人群活動穩定，並自成一體的長時期文化類型。柴煥波、龍京沙，〈永順縣不二門商周時期遺址〉，收入《中國考古學年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294-295。柴煥波，〈湘西商周文化的探索〉，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學會，《湖南考古2002》(長沙：岳麓書社，2003)，頁522-526。

水流域的文化，可說是尚未形成共性的幾支地區文化，彼此間互有聯繫，卻又具有獨立的發展軌跡。

商人勢力亦曾進駐洞庭湖地區，岳陽銅鼓山遺址即為商文化於江南發展的代表，遺址開發年代始於商代前期(與鄭州二里崗下層相當)，最晚可延續至殷都北遷之後(殷墟時期)，是湘江、資水下游等洞庭湖以東地區，所知時代最早的殷商時期文化遺存。

銅鼓山遺址位於岳陽市郊，商代遺物有以鬲與大口缸為主的陶器，次為少量石器以及硬陶，也有小型青銅製品出土。當地出土陶器，均屬中原二里崗商文化的典型器物，遺址面貌相當貼近於盤龍城。⁷⁵銅鼓山文化遺存除了以中原商文化為主，還吸收鄰近澧水流域，以及東南地區印紋陶文化因素。銅鼓山遺址反應了商人沿長江水系推展勢力的成果，然而商人勢力進入岳陽地區後，卻始終未再向南發展，銅鼓山可能即為商人扼守湘江流域地方勢力的據點。⁷⁶

四、吳城文化發展

(一) 商代後期「南土」面貌

盤龍城城址在商人遷殷之前(二里崗後期)，出現墓葬打破城址西垣的現

⁷⁵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陽市文物工作隊，〈岳陽市郊銅鼓山商代遺址與東周墓發掘報告〉，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學會，《湖南考古輯刊》，5(長沙，1989.12)，頁29-45、200。

⁷⁶ 郭勝斌，〈銅鼓山商代遺存文化因素分析〉，《江漢考古》，4(武漢，2001.12)，頁40-48。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銅文化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8)，頁35-52。

象，顯示城址性質有所轉變。至殷墟時期，整體聚落便不再出現商人活動遺跡，盤龍城就此荒廢。⁷⁷不過，商代後期漢水以東的遺址墓葬，分布卻較前期更為廣泛，文化面貌益形豐富，並以黃陂出土遺跡最多，次為孝感、雲夢、安陸和應城等地。主要遺址有郭袁嘴、袁李灣、張韓家灣、聶家寨、臺子湖與曬書臺等處，墓葬則有鍾分衛灣、鍾家崗、官家寨與泊沫港。⁷⁸此外亦有發現不少窖藏與散件青銅器，出土地點遍及襄樊、棗陽、隨縣，孝感地區的應山、安陸、應城，武漢地區的黃陂、漢陽、新洲，鄂州鄂城，黃石的大冶、陽新，以及崇陽等地。⁷⁹

漢水以西地區，江陵荊南寺遺址文化延續至殷墟初期，⁸⁰其後荊州地區則以沙市周梁玉橋、官堤⁸¹以及江陵梅槐橋⁸²等遺址，作為商代後期文

⁷⁷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頁448。

⁷⁸ 余從新，〈安陸曬書臺商周遺址試掘〉，《江漢考古》，1(武漢，1980.03)，頁64。熊卜發，〈鄂東北地區古代文化發展序列概述〉，收入熊卜發主編，《鄂東北考古報告集》，頁5-6。

⁷⁹ 關於商代後期漢水以東商代銅器出土概況，詳見李珮瑜，〈商代出土銅器銘文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頁120-123。

⁸⁰ 何篤，〈荊南寺遺址夏商時期遺存分析〉，頁86。

⁸¹ 周梁玉橋與官堤遺址位於沙市市東北近郊，遺址年代為商代晚期。發掘有房基、灰坑、祭祀坑與窯址。詳見沙市市博物館，〈湖北沙市周梁玉橋遺址試掘簡報〉，收入《文物資料叢刊》，10(北京，1987.03)，頁22-31。彭錦華，〈沙市周梁玉橋殷商遺址試析〉，《江漢考古》，2(武漢，1989.06)，頁45-56。湖北省博物館，〈沙市官堤商代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4(武漢，1985.12)，頁1-9。

⁸² 梅槐橋遺址位於江陵縣縣城西，發掘有商代殷墟時期文化層。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系，〈湖北江陵梅槐橋遺址發掘簡報〉，《考古》，9(北京，1990.09)，頁790-796。

化代表。由於周梁玉橋與梅槐橋遺址均有卜甲出土，學者曾將該地劃歸為商人統治的區域，⁸³然而出土卜甲、卜骨無法證明商人與地方族群之間的直接聯繫，加以當地文化面貌獨特，出土器物以鼎、釜、甕等器類為主，商文化因素並不突出，應為一支受到商文化影響，但仍自成體系的地區性文化，同類型遺址主要分布於江陵、沙市一帶，於松滋地區亦有所發現。⁸⁴

無獨有偶地，在洞庭湖東部湘江下游，地區文化於商代後期也呈現巨大變化，銅鼓山遺址文化已漸趨消亡，岳陽市以南則出現對門山、⁸⁵老鵝洲、溫家山⁸⁶與玉筍山⁸⁷等商代後期遺址，⁸⁸出土陶器均截然分為兩群，除

⁸³ 彭錦華，〈沙市周梁玉橋殷商遺址試析〉，頁52-53。

⁸⁴ 松滋地區發現有博宇山遺址，時代屬晚商，出土炊器以鼎為主，器形與周梁玉橋遺址相近。詳見荊州地區博物館，〈湖北松滋博宇山遺址試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10(北京，1987.03)，頁22-31。

⁸⁵ 對門山遺址位於洞庭湖東岸，遺址年代為商代後期前段，發掘者認為對門山遺址應為專門燒製陶器的窯場。詳見岳陽文物工作隊，〈岳陽縣對門山商代遺址發掘報告〉，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學會，《湖南考古輯刊》，6(長沙，1994.04)，頁64-75。

⁸⁶ 老鵝洲與溫家山遺址發掘資料尚未正式公佈，轉引於何介鈞，〈湖南省商時期古文化研究〉，頁47-53。

⁸⁷ 汨羅玉筍山遺址位於岳陽地區西南，遺址時代為殷墟一期至三期，發現有灰坑與墓葬。玉筍山遺址文化以地方性質為主，商文化影響日趨消退，印紋陶文化影響力漸增。詳見何捷，〈試論汨羅玉筍山商代遺址〉，收入湖南中青年考古學者論文選集選委會編，《考古耕耘錄——湖南中青年考古學者論文選集》(長沙：岳麓書社，1999)，頁185-190。

⁸⁸ 根據郭勝斌統計，洞庭湖東岸商代遺址墓群目前總計多達一百一十八處，其中確認為商代前期遺址的僅有銅鼓山一處，而與銅鼓山遺址具有相同特性的遺存亦相當少。詳見郭勝斌，〈商時期洞庭湖東岸青銅文化的年代分

了繼承商代前期文化既有內涵，也新出現另一群以釜、鼎與豆為主器物，以及硬陶、釉陶器，使當地文化面貌更趨於多元。⁸⁹商代晚期的湘江下游，地方文化以岳陽費家河遺址為代表。費家河遺址清理有多座陶窯與灰坑，出土陶器，文化面貌可析分為商文化、地方性文化，以及源於贛北地區的文化因素。⁹⁰

澧水流域的斑竹遺址則承繼皂市文化發展，該遺址位於澧東鄉斑竹村，濱臨沮水北岸。遺址時代始於晚商(第一期約當殷墟後期階段)，出土器物除卻少量的鬲和異形簋，與商文化相關器物均不復見。然而遺址所獲的地方性器物與皂市文化一脈相承，鮮明的特徵顯示本地文化持續發展。⁹¹

與長江北岸的情況相同，江南於商代後期亦出土大量青銅器，已累積有數百件青銅器。並且集中於湘江下游，澧水沿岸的寧鄉、黃材一帶出土，此外則零散分布在資水、沅水、澧水和洞庭湖沿岸等地。⁹²湖南出土青銅

期與文化性質》，收入湖南中青年考古學者論文選集選委會編，《考古耕耘錄——湖南中青年考古學者論文選集》，頁180。

⁸⁹ 何介鈞，〈湖南省商時期古文化研究〉，頁48-53。

⁹⁰ 費家河遺址為費家河河岸包括水廟嘴、雙燕嘴、撲拜廟、杉刺園、窯田子與王神廟等處的窯址與灰坑遺跡。詳見湖南省博物館、岳陽地區文物工作隊、岳陽市文管所，〈湖南岳陽費家河商代遺址和窯址的探掘〉，《考古》，1(北京，1985.01)，頁1-6。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銅文化研究〉，頁52-90。

⁹¹ 何介鈞、曹傳松，〈湖南澧縣商周時期古遺址調查與探掘〉，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學會，《湖南考古輯刊》，4(長沙，1987.10)，頁1-10。

⁹² 關於湖南青銅器出土概況，詳見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銅文化研究〉，頁234-248。

器器形多種，部份器物與中原銅器相仿，而具有地方特色者也不少見，且以動物造型與紋樣最為特殊。地方性銅器除了鏡、鐘和罇之外，尊與卣亦為當地較受重視之器類，中原文化重視的飲器則不見於江南。⁹³

關於湖南商代後期的文化屬性，學界至今意見分歧，並以近年發掘的望城縣高砂脊遺址作為爭議焦點。高砂脊遺址位於湘江下游西岸，地處瀉水、湘江交會處的長形沙洲。遺址時代始於商末，主要遺跡為墓葬，另有灰坑、溝與陶窯，掘獲遺存有陶器、石器，以及與墓葬相隨的銅器，為湖南境內唯一銅器、陶器共出於墓葬的完整考古發現。發掘者將高砂脊遺存分為外來與本地因素，認為該地是以外來因素為主體的融合性文化，中原文化已非當地文化主體。⁹⁴不過高砂脊遺址的地方性文化因素可能被高估，其出土銅器在形制上，其實近似於中原晚商之器，或直接由中原傳入。而寧鄉、黃材出土的銅器群，方可確認為湖南本地青銅文化。⁹⁵

雖然湖南出土的青銅器，絕大部份與墓葬遺址缺乏聯繫，也鮮少出現器銘可資辨識，不但無法確認銅器持有者的族群身分，更難以釐清這些銅

⁹³ 何介鈞，〈試論湖南出土商代青銅器及商文化向南方傳播的幾個問題〉，原載氏著，《湖南先秦考古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6），後收入李伯謙編，《商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560。施勁松，《長江流域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149-151。

⁹⁴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市博物館、長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縣文物管理所，〈湖南望城縣高砂脊商周遺址的發掘〉，《考古》，4（北京，2001.04），頁27-44。

⁹⁵ 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銅文化研究》，頁100-102。施勁松，〈對湖南望城高砂脊出土青銅器的再認識〉，《考古》，12（北京，2002.12），頁58-63。

器的使用歷程。⁹⁶因此對於湘北地區商代文化，僅能形成下述認知：瀉水流域在商代後期為一青銅器高度密集區，當地住民因於儲存財富或宗教祭祀等需求，普遍將器物埋藏於湖濱河岸或山腳處。⁹⁷雖然本地住民亦有自行鑄造銅器的可能，但至商周之際，中原文化仍持續輸入當地，對於江南影響深遠無庸置疑。

(二) 吳城文化的興盛

商代前期，商文化於長江南岸的九江、瑞昌一帶深具影響力，並且沿鄱陽湖、贛江進入吳城核心地區。不過鄱陽湖區周邊的殷商時期文化，組成性質複雜，往來交流頻繁，其發展態勢約可以鄱陽湖與贛江作為分界：在鄱陽湖以東，昌江至信江流域主要屬萬年類型文化；鄱陽湖以西，概屬吳城文化範疇。⁹⁸若就政治擴張幅度而論，商族與當地族群勢力互有消長，大抵交錯於鄱陽湖西側、修水以北之地。

進入商代後期，鄱陽湖以西地區出現引人注目的發展：在修水北側的德安，出現一支以陳家墩遺址為核心，承繼商代前期石灰山遺址發展，並整合鄱陽湖水系多元文化特質的群體。⁹⁹而贛江中下游，吳城文化則以贛

⁹⁶ 向桃初指出湖南青銅器缺乏材料證明可證明埋藏年代，目前少數可辨識的銅器埋藏年代多屬西周時段。詳見向桃初，《湘江流域商周青銅文化研究》，頁394-400。

⁹⁷ 湖南地區青銅器埋藏環境類似，多為湖濱河邊，或者山頂山腰，以及源於高山山腳的溪流等地。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漫步》，頁35。

⁹⁸ 彭明瀚，〈贛江鄱陽湖區商代文化的區系類型研究〉，《考古》，3(北京，2004.03)，頁68-79。

⁹⁹ 李家和、楊巨源、劉詩中，〈江西萬年類型商文化研究〉，《東南文化》，

江中游樟樹市吳城遺址為核心，成為贛江、鄱陽湖流域的青銅文化代表。

¹⁰⁰吳城遺址出土遺存可區分為地方文化與商文化兩組系統，發掘者認為吳城主體淵源於商，又以此為基礎開創自身特色。¹⁰¹

在盤龍城仍作為商人城邑之時，贛江中游的吳城也開始興築城垣，當商都北遷至安陽，盤龍城為使用者所廢棄，吳城住民則重新修築城垣，開挖壕溝，成為一座深具規模的環壕城邑。遺址發掘者根據此階段出土用器文物的風格，判定有一定數量的盤龍城原居群體遷徙至此地。¹⁰²其後，吳城城址的中心設立公共區，其設施是由居用建築、紅土臺地和長廊建築所覆蓋的道路所構成。¹⁰³城址西北則建有規格齊整的陶窯，東部則為冶鑄區，城內居址的發掘資料尚少，但已出土住房、水井、灰坑與窖穴，城址

3(南京，1990.05)，頁142-16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縣博物館，〈江西德安縣陳家墩遺址發掘簡報〉，《南方文物》，2(南昌，1995.06)，頁30-4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德安縣博物館，〈陳家墩遺址第二次發掘簡報〉，《南方文物》，3(南昌，2000.09)，頁6-17。

¹⁰⁰詳見李伯謙，〈試論吳城文化〉，原載《文物集刊》，3(北京，1981.03)，後收入氏著，《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頁218-23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吳城：1973~2002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頁419。

¹⁰¹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吳城：1973~2002年考古發掘報告》，頁412-413。

¹⁰²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吳城：1973~2002年考古發掘報告》，頁415。

¹⁰³發掘報告認定該批建築屬宗教性質，是祭祀廣場與公廳構成的祭祀區。本文則以為相關建築的用途不明，視作公共區較為妥當。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吳城：1973~2002年考古發掘報告》，頁69-75。

整體規劃井然。¹⁰⁴

吳城文化主要的經濟生產為製陶與冶煉。城址北區已知分布有十餘座各類型陶窯，圓窯以及龍窯並存，可量產需要高溫燒製的高品質陶器與青瓷。此外，出土陶器多刻印有類於甲骨刻辭的文字，或是圖像符號，其意義已不僅限於裝飾，可能具有計數或辨識作用。吳城製陶業可說為鄱陽湖區陶瓷生產體系的中心。¹⁰⁵由於陶範與鑄件的出土，城址內部又集中出現含有銅渣的灰坑，故推斷吳城已能冶煉銅器。但相關技術細節未能釐清，至今也不見容器鑄範，而城址遺跡出土的青銅器，多屬陪葬品，數量稀少。目前對於商代後期長江流域青銅器的討論，多以新淦出土銅器群為主。¹⁰⁶

新淦一地與吳城隔贛江相對，由於新淦大墓與牛城遺址的出土，被認為是贛江流域在商代後期的核心要地之一。江西贛江中游大洋洲的新淦大

¹⁰⁴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吳城：1973~2002年考古發掘報告》，頁75-86。

¹⁰⁵ 屬萬年文化分布區的鷹潭也曾發現商代後期大型窯址，不過該地文化與閩浙聯繫較深，就經濟生產而言，其製造運銷與吳城可能非同一體系。江西省文物工作隊、鷹潭市博物館，〈鷹潭角山商代窯址試掘簡報〉，《江西歷史文物》，2（南昌，1987.12），頁32-44。

¹⁰⁶ 贛江流域出土的商代銅器，包括大洋洲新淦大墓以及中稜水庫銅器群。中稜水庫銅器群共計有鼎、甗、爵等9件，最初被斷定為西周墓葬銅器，近年學界則普遍認為銅器年代應屬商代晚期，早於新淦大墓。李朝遠，〈江西新淦中稜青銅器的再認識〉，原載高崇文、安田喜憲，《長江流域青銅器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後收入氏著，《青銅器學步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177-183；唐際根、荊志淳，〈商時期贛江流域的青銅文化格局〉，收入唐際根，《考古與文化遺產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279-289。

墓，墓葬年代約當殷墟中期。¹⁰⁷進入殷墟後期，吳城城址發展漸趨衰頹，城址內外雖然仍有住居，但城址原有的機能運作均告停擺，贛江中游的政治重心有所轉移，新淦牛城作為吳城之後的政體中心，文化發展延續至西周。¹⁰⁸

新淦出土銅器的組合以炊器為主，盛酒器和食器為輔，除瓚之外沒有飲器，炊器則以鼎為主。犁、鏵、耒、耜等農具陪葬品的出土，當地文化可能將農具併入禮器之列，中原禮制文化並未得到全面性認同。以新淦大墓為代表的文化，是一支受商文化影響的部族，並非商人直接進行拓殖的據點。不過中原商文化表現深刻，增益當地族群文化面貌性質。¹⁰⁹而新淦出土青銅器，所採用的工藝技術，也可能源於商代前期盤龍城。¹¹⁰上述現

¹⁰⁷ 新淦商代遺址的性質另有祭祀坑之說，本文則從發掘報告視為墓葬。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淦縣博物館，《新淦商代大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頁191-192。

¹⁰⁸ 牛城遺址與中稜水庫銅器群、新淦大墓地緣關係密切，遺址發掘者認為牛城城址始建於吳城晚期，並且沿用至西周。牛城因此被視為承繼吳城地位的政體，文化發展延續至西周。不過亦有研究根據中稜水庫銅器群的年代，認為牛城是由商代中期發展至後期的商城，出土文物與中稜一帶相應，是與吳城並行發展的聚落。相關爭議尚待更進一步的資料出土公佈，方得釐清。朱福生，〈江西新淦牛城遺址調查〉，《南方文物》，4（南昌，2005.12），頁4-7。唐際根、荊志淳，〈商時期贛江流域的青銅文化格局〉，頁283-289。

¹⁰⁹ 根據《新淦商代大墓》分析，當地出土器物型式是以融合式最多，次為殷商式，土著式與先周式類型分別僅有四件。不過融合式器物為地方自行鑄造，與中原器物有所區隔，應視之為當地文化代表器形。詳見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淦縣博物館，《新淦商代大墓》，頁192。施勁松，《長江流域青銅器研究》，頁26。

¹¹⁰ 新淦大洋洲青銅器以大量使用銅蕊撐為特色，該技術最早見於商代前期盤

象反應了商人於江西境內的文化影響力，持續至殷墟中期仍產生相當作用。

五、結語

殷商政權所建構的「南土」空間，基本上是一個不斷盈縮的區塊，對於殷商時期的中原或南方住民而言，長江並非是一條隔閡互動的假想界線，反而是彼此溝通聯絡的重要管道。透過長江的連繫，中原商族逐步串接眾多點狀政治中心，試圖統整出隸屬於中原政權的「南土」。然而，中原文化將青銅器組成之禮制體系引入「南土」，地方族群對於外來制度的回應，則是更新或重組中原器物的意義。商人於長江中游的發展，始終未能超越既有地域文化格局。

殷商政權經營長江流域之盛景，成形於盤龍城的建立。當時商人通過隨棗走廊進入江漢地區，以今日之武漢、孝感與隨州地區作為發展腹地，並將長江作為勢力拓殖的主要通道。商人勢力曾南渡長江，駐進九江神墩和瑞昌銅嶺兩地，又逆江至岳陽開發銅鼓山，作為箝制湘江流域的重鎮。商代前期商人所掌控的「南土」，即是由漢東與長江中游沿岸的零星據點構築而成。至於漢水以西以及澧水流域，雖然與商文化互動頻繁，但當地文化屬性變動劇烈，商人與商文化在此區域，幾乎不曾佔有優勢。商代後

龍城青銅器。詳見蘇榮譽、華覺明、彭適凡、詹開遜等，〈新淦商代大墓青銅器鑄造工藝研究〉，收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淦縣博物館，《新淦商代大墓》，頁294-296。胡家喜、李桃元、李秀輝、李京華，〈盤龍城遺址青銅器鑄造工藝研究〉，收入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頁590-593。

期，中原政權重心北移，商文化向外發展幅度縮減，南下商人似乎即順應趨勢，放棄盤龍城此一發展重鎮，未再建立同等規模的新據點。

盤龍城作為殷商王朝勢力南進的重鎮，以盤龍城為核心的運作機制，可說是商人經營南土的根本體制。本文認為盤龍城為一方國都城，而盤龍城物質文化和中原的高度相似性，則為商族向四方拓土分封的反映。盤龍城建城不久之後，很可能由於殷商王室的政策操作，喪失政治地位。中原政權在盤龍城停止運作後，依然掌握了有效轉輸資源的途徑。殷墟所出土的南方硬紋陶與青瓷，至少便說明了南北仍存在著物資流通管道。¹¹¹殷商王朝的權力擴張，並非專以索求資源為導向，不應將盤龍城單純視作擷取南土資源的據點。

盤龍城廢棄後，鄱陽盆地的吳城為繼起之地方強勢文化。盤龍城與吳城兩地族群，雖然在銅器鑄煉等產業，具有技術移轉關係，但依據現有考古資料，還未見足夠證據顯示吳城文化得以獨佔礦產資源。吳城整體礦冶發展，仍不如作為陶器生產中心的地位明確。湘江以北之地，是商代後期長江流域另一個銅禮器密集使用區，不過當地亦未發現進行大規模銅器鑄煉遺跡。商代長江中游地域核心的成形，不只取決於礦產資源的掌控，還可能牽涉到整體物資的生產流通，以及區域政權的政治布局。

北遷至安陽的殷商王朝與吳城文化等地方族群，彼此之間關係是對等或統屬，以及安陽地區如何維繫銅礦資源供應等議題，受限於出土資料，本文未能一併討論，尚待未來整合新出資料，再行探討。

¹¹¹ 楊寶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頁204-208。

參考書目

一、傳世文獻

1. [漢]劉安(編), [漢]高誘(注), 《淮南子》, 臺北: 臺灣中華書局, 1993 六版二刷, 據武進莊氏本校刊。
2.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 《毛詩》, 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 《漢魏古注十三經》, 北京: 中華書局, 1998。
3. [清]孫星衍, 陳抗、盛冬鈴(點校), 《尚書今古文注疏》, 北京: 中華書局, 2004 二版。

二、近人專著

1. 丁山, 《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 北京: 中華書局, 1988。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小屯南地甲骨》, 上海: 中華書局, 1983。
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的發現與研究》,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94。
4. 向桃初, 《湘江流域商周青銅文化研究》, 長沙: 岳麓書社, 2008。
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淦縣博物館, 《新淦商代大墓》,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昌博物館, 《銅嶺古銅礦遺址的發現與研究》, 南昌: 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7。
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樹市博物館, 《吳城: 1973~2002 年考古發掘報告》,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05。

8. 宋新潮，《殷商區域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
9. 李雪山，《商代分封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10.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考古隊河南分隊編，《浙川下王崗》，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11. 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襄樊市博物館、隨州市博物館，《西花園與廟臺子》，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12. 施勁松，《長江流域青銅器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13. 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弘前：中國學研究會，1958。
14. 張光直著，張良仁、岳紅彬、丁曉雷譯，《商文明》，瀋陽：遼寧出版社，2002。
15. 張渭蓮，《商文明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16. 曹錦炎、沈建華編著，《甲骨文校釋總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6。
17. 郭沫若，《殷契粹編》，收入郭沫若著作編輯委員會編，《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三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
18.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三冊，上海：中華書局，1978。
19.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四冊，上海：中華書局，1979。
20.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十冊，上海：中華書局，1981。
21.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一冊，上海：中華書局，1982。
22. 郭沫若主編，《甲骨文合集》第十二冊，上海：中華書局，1983。
23.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2004重印。
24.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2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考古漫步》，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

26. 楊寶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27. 魯西奇，《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漢水流域的個案考察》（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123-124。
28. 鄭杰祥，《商代地理概論》，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三、期刊論文

1. 王文健、龍西斌，〈石門縣商時期遺存調查——寶塔遺址與桅崗墓葬〉，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學會，《湖南考古輯刊》，4(長沙，1987.10)，頁11-18。
2. 石璋如，〈殷代的鑄銅工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6(臺北，1955.06)，頁95-129。
3. 朱福生，〈江西新淦牛城遺址調查〉，《南方文物》，4(南昌，2005.12)，頁4-7。
4. 江西省九江縣馬回嶺遺址調查隊、九江市文化名勝管理處、九江縣文物管理所，〈九江縣龍王嶺遺址試掘〉，《東南文化》，6(南京，1991)，頁174-179。
5.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九江縣文物管理所，〈九江神墩遺址發掘簡報〉，《江西歷史文物》，2(南昌，1987.12)，頁1-19。
6.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鷹潭市博物館，〈鷹潭角山商代窯址試掘簡報〉，《江西歷史文物》，2(南昌，1987.12)，頁32-44。
7.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德安縣博物館，〈江西德安石灰山商代遺址發掘簡報〉，《南方文物》，4(南昌，1998.12)，頁1-12。
8.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德安縣博物館，〈陳家墩遺址第二次發掘簡報〉，《南方文物》，3(南昌，2000.09)，頁6-17。

9.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縣博物館，〈江西德安縣陳家墩遺址發掘簡報〉，《南方文物》，2（南昌，1995.06），頁30-49。
10. 何介鈞，〈湖南省商時期古文化研究〉，收入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省博物館四十週年紀念論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頁47-68。
11. 何介鈞，〈試論湖南出土商代青銅器及商文化向南方傳播的幾個問題〉，原載氏著，《湖南先秦考古學研究》（長沙：岳麓書社，1996），後收入李伯謙編，《商文化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560-574。
12. 何介鈞、曹傳松，〈湖南澧縣商周時期古遺址調查與探掘〉，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學會，《湖南考古輯刊》，4（長沙，1987.10），頁1-10。
13. 何捷，〈試論汨羅玉筍山商代遺址〉，收入湖南中青年考古學者論文選集選委會編，《考古耕耘錄——湖南中青年考古學者論文選集》（長沙：岳麓書社，1999），頁185-190。
14. 何篤，〈荊南寺遺址夏商時期遺存分析〉，收入北京大學考古系編，《考古學研究(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78-100。
15. 余從新，〈安陸曬書臺商周遺址試掘〉，《江漢考古》，1（武漢，1980.03），頁64。
16. 李伯謙，〈試論吳城文化〉，原載《文物集刊》，3（北京，1981.03），後收入氏著，《中國青銅文化結構體系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頁218-230。
17. 李珮瑜，〈商代出土銅器銘文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18. 李學勤（江鴻），〈盤龍城與商代南土〉，《文物》，2（北京，1976.02），後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650-655。

19. 宋鎮豪，〈商代的王畿、四土與四至〉，《南方文物》，1(南昌，1994.03)，頁55-59、48。
20. 孝感地區博物館，〈孝感、黃陂兩縣部份遺址複查簡報〉，《江漢考古》，4(武漢，1983.12)，頁1-13。
21. 孝感地區博物館、孝感市博物館，〈湖北孝感聶家寨遺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武漢，1994.06)，頁1-13。
22. 李家和、楊巨源、劉詩中，〈江西萬年類型商文化研究〉，《東南文化》，3(南京，1990.05)，頁142-160。
23. 李朝遠，〈吳地青銅器未受商文化影響論〉，《上海博物館集刊》，8(上海，2000)，頁79-97。
24. 李朝遠，〈江西新淦中稜青銅器的再認識〉，原載高崇文、安田喜憲，《長江流域青銅器文化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後收入氏著，《青銅器學步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177-183。
25. 杜金鵬，〈盤龍城商代宮殿基址討論〉，《考古學報》，2(北京，2005.04)，頁161-184。
26. 沙門市博物館，〈湖北沙市周梁玉橋遺址試掘簡報〉，收入《文物資料叢刊》，10(北京，1987.03)，頁22-31。
27. 岳陽文物工作隊，〈岳陽縣對門山商代遺址發掘報告〉，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學會，《湖南考古輯刊》，6(長沙，1994.04)，頁64-75、63。
28. 拓古，〈二里頭文化時期的江漢地區〉，《江漢考古》，1(武漢，2002.03)，頁86-87。
29. 近藤喬一，〈商代海貝的研究〉，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中國商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頁389-412。

30. 武漢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湖北新洲香爐山遺址(南區)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武漢，1993.03)，頁14-19、87。
31. 武漢市博物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黃陂縣文物管理所，〈1997-1998年盤龍城發掘簡報〉，《江漢考古》，3(武漢，1998.09)，頁34-48。
32. 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化館，〈羅山縣蟒張後李商周墓地第二次發掘簡報〉，《中原文物》，4(鄭州，1981.08)，頁4-13。
33. 信陽地區文管會、羅山縣文管會，〈羅山縣蟒張後李商周墓地第三次發掘簡報〉，《中原文物》，1(鄭州，1988.02)，頁14-20。
34. 南普恒、秦穎、李桃元、董亞巍，〈湖北盤龍城出土部分商代青銅器鑄造地的分析〉，《文物》，8(北京，2008.08)，頁77-82。
35. 施勁松，〈對湖南望城高砂脊出土青銅器的再認識〉，《考古》，12(北京，2002.12)，頁58-63。
36. 胡厚宣，〈殷代封建制度考〉，收入氏著，《甲骨學商史論叢初集》第一冊(北京：北京圖書館，2000)，頁1-40。
37. 胡家喜、李桃元、李秀輝、李京華，〈盤龍城遺址青銅器鑄造工藝研究〉，收入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頁576-598。
38. 范學斌、張萬高，〈簡論湘北鄂西地區商時期的鼎釜文化〉，收入湖北省考古學會選編，《湖北省考古學會論文選集(三)》(武漢：江漢考古雜誌社，1998)，頁39-48。
39. 唐際根、荆志淳，〈商時期贛江流域的青銅文化格局〉，收入唐際根，《考古與文化遺產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279-289。
40. 徐燕，〈豫西地區夏文化的南傳路線初探〉，《江漢考古》，3(武漢，2005.09)，頁54-62。
41. 柴煥波，〈湘西商周文化的探索〉，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

- 省考古學會，《湖南考古2002》(長沙：岳麓書社，2003)，頁522-533。
42. 柴煥波、龍京沙，〈永順縣不二門商周時期遺址〉，收入《中國考古學年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294-295。
 43. 荆州市博物館、鍾祥市博物館，〈鍾祥亂葬崗夏文化遺存清理簡報〉，《江漢考古》，3(武漢，2001.09)，頁38-43。
 44. 荆州地區博物館，〈湖北松滋博宇山遺址試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10(北京，1987.03)，頁22-31。
 45. 荆州地區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系，〈湖北江陵荆南寺遺址第一、二次發掘簡報〉，《考古》，8(北京，1989.08)，頁679-698。
 46. 張光直，〈關於中國初期「城市」這個概念〉，原載《文物》，2(北京，1978.02)，後收入氏著，《中國青銅時代(第二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頁1-16。
 47. 張昌平，〈盤龍城商代青銅容器的初步考察〉，《江漢考古》，1(武漢，2003.03)，頁45-51。
 48. 張昌平，〈夏商時期中原與長江中游地區的文化聯繫〉，《華夏考古》，3，(鄭州，2006.09)，頁54-60。
 49. 張懋鎔、趙榮、鄒東濤，〈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義〉，原載《文物》，7(北京，1989.07)；後收入氏著，《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頁24-33。
 50. 郭勝斌，〈商時期洞庭湖東岸青銅文化的年代分期與文化性質〉，收入湖南中青年考古學者論文選集選委會編，《考古耕耘錄——湖南中青年考古學者論文選集》，頁162-184。
 51. 郭勝斌，〈銅鼓山商代遺存文化因素分析〉，《江漢考古》，4(武漢，2001.12)，頁40-48。
 52. 陳賢一，〈江陵張家山遺址的試掘與探索〉，《江漢考古》，2(武漢，

- 1980.06), 頁77-86。
53. 彭明瀚, 〈銅與青銅時代中原王朝的南侵〉, 《江漢考古》, 3(武漢, 1992.09), 頁47-49、46。
54. 彭明瀚, 〈商代虎方文化初探〉, 《中國史研究》, 3(北京, 1995.03), 頁101-108。
55. 彭明瀚, 〈贛江鄱陽湖區商代文化的區系類型研究〉, 《考古》, 3(北京, 2004.03), 頁68-79。
56. 彭錦華, 〈沙市周梁玉橋殷商遺址試析〉, 《江漢考古》, 2(武漢, 1989.06), 頁45-56。
57. 彭錦華, 〈沙市李家臺早期文化遺存淺議〉, 收入湖北省考古學會選編, 《湖北省考古學會論文選集(三)》(武漢: 江漢考古雜誌社, 1998), 頁61-67。
5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悟縣城關鎮雙河村李家灣遺址發掘簡報〉, 《江漢考古》, 3(武漢, 2000.09), 頁16-22。
59.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陽新縣博物館, 〈陽新大路鋪遺址東區發掘簡報〉, 《江漢考古》, 3(武漢, 1992.09), 頁10-21。
60. 湖北省博物館, 〈沙市官堤商代遺址發掘簡報〉, 《江漢考古》, 4(武漢, 1985.12), 頁1-9。
61. 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系, 〈湖北江陵梅槐橋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 9(北京, 1990.09), 頁790-796。
6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石門皂市商代遺存〉, 《考古學報》, 2(北京, 1992.04), 頁185-219。
63.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市博物館、長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縣文物管理所, 〈湖南望城縣高砂脊商周遺址的發掘〉, 《考古》, 4(北京, 2001.04), 頁27-44。

6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陽市文物工作隊，〈岳陽市郊銅鼓山商代遺址與東周墓發掘報告〉，收入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學會，《湖南考古輯刊》，5(長沙，1989.12)，頁29-45、200。
65. 湖南省博物館、岳陽地區文物工作隊、岳陽市文管所，〈湖南岳陽費家河商代遺址和窯址的探掘〉，《考古》，1(北京，1985.01)，頁1-6。
66. 鄂博、崇文，〈湖北崇陽出土一件銅鼓〉，《文物》，4(北京，1978.04)，頁94。
67. 黃岡地區博物館、黃州市博物館，〈湖北黃州下窯嘴商墓發掘簡報〉，收入吳曉松主編，《鄂東考古發現與研究》(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頁164-169。
68. 黃鏗、況紅梅，〈近年黃陂出土的幾件商周青銅器〉，《江漢考古》，4(武漢，1998.12)，頁24-25、29。
69. 楊升南，〈卜辭中所見諸侯對商王室的臣屬關係〉，收入胡厚宣編，《甲骨文與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頁128-172。
70. 楊鴻勛，〈盤龍城商方國宮殿建築復原研究〉，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盤龍城：1963-1994年考古發掘報告》，頁629-649。
71. 楊權喜，〈湖北商文化與商朝南土〉，收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奮發荆楚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論文集》(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頁115-121。
72. 萬全文，〈商周王朝南進掠銅論〉，《江漢考古》，3(武漢，1992.09)，頁50-57。
73. 熊卜發，〈湖北孝感地區商周古文化調查〉，《考古》，4(北京，1988.04)，頁300-306、313。
74. 熊卜發，〈淺談鄂東北地區古代文化〉，收入熊卜發編，《鄂東北地區文物考古》(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5)，頁1-10。

75. 熊卜發，〈鄂東北地區古代文化發展序列概述〉，收入熊卜發主編，《鄂東北考古報告集》，頁1-15。
76. 熊卜發、鮑方鐸，〈黃陂出土的商代晚期青銅器〉，《江漢考古》，4(武漢，1986.12)，頁27-28。
77. 劉莉、陳星燦，〈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二里頭和二里岡時期中心和邊緣地區之間的關係〉，《古代文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頁71-134。
78. 劉森淼，〈盤龍城外緣帶狀夯土遺跡的初步認識〉，收入武漢市委宣傳部、武漢市歷史文化名城委員會主編，《武漢城市之根·商代盤龍城與武漢城市發展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2)，頁190-197。
79. 黎澤高、趙平，〈枝城市博物館藏青銅器〉，《考古》，9(北京，1989.09)，頁775-778。
80. 盧連成，〈商代社會疆域地理的政治架構與周邊地區青銅文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4(西安，1994.12)，頁30-56。
81. 隨州市博物館，〈湖北隨縣發現商代青銅器〉，《文物》，8(北京，1981.08)，頁46-48。
82. 襄石復線襄樊考古隊，〈湖北襄陽法龍王樹崗遺址二里頭文化灰坑清理簡報〉，《江漢考古》，4(武漢，2002.12)，頁44-50。
83. 蘇榮譽、華覺明、彭適凡、詹開遜等，〈新淦商代大墓青銅器鑄造工藝研究〉，收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館、新淦縣博物館，《新淦商代大墓》，頁257-300。
84. 饒宗頤，〈殷代地理疑義舉例——古史地域的一些問題和初步詮釋〉，《九州》，3(北京，2003)，頁52-65。

*Dwell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my kingdom: Panlongcheng site
and the management of 'Nan Tu' 南土 in Shang period*

Chia-pei Che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Panlongcheng site in Hubei is the first site of Shang discovered in the middle Yangzi River valley. This discovery has overturned the taken-for-granted hypothesis that south part of Shang's territory, 'Nan Tu' (南土) had established in the Huai River, and Shang culture had never expanded across the Yangzi River. This paper mainly has a survey of the spread of Shang culture in south region. By analyzing the variation of 'Nan Tu', we can comprehend the details of culture intercourse, and it can be regarded as the framework of political structural system of Shang. According to the capital of Shang, discussion is divide into two parts, the former (the Erligang culture) and the later (the Yinxu culture) stage of Shang.

Systematic researches on related archaeological data from the Shang period,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m with literal records have showed 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Nan Tu'. In the period of the Erligang culture, east part of Jiang-Han Plain and the bank of the Yangzi River are all territories of Shang with varying local autonomy. But the culture expansion from Central Plains has declined after the first phase of the Yinxu culture, expander of Shang seems to be catching the wave. Panlongcheng site was ruined after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Upper Erligang culture. Local culture has progressed in

state of the art, and emerged independent character. Wucheng culture in the area of Poyang Lake flourished in Yinxu period, and became the development force at the core. Shang culture is no longer hegemonic, but still held sphere of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Yangzi River valley.

Key words: Shang period, Nan Tu, the middle Yangzi River valley, Panlongcheng, Wucheng culture